



父亲的奋斗史

□蓝林

不易看见的广福

□许晓轸

父亲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家里排行老二，上有哥哥，下有两个妹妹。爷爷为了爱情，为了家庭，放弃了市里的工作，跟着阿爷（奶奶）一起回到娘家天全县梅岭乡梅子坡的大山里。爷爷不会做农活，一直在乡里学校的食堂做工。大伯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，两个姑姑都在上学，平时家里的农活都是父亲帮着阿爷一起做。其实他也不想当兵，体检都通过了，但因为家里需要，他便留了下来，没有一丝怨言。

父亲和母亲结婚后，1983年底我出生了，三年后妹妹也出生了。老家农村很多人说，女孩子认得到字就是了，反正以后都要嫁人的。父亲对这种话从不理睬，只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：“只有把书读出来了，才能走出大山！”几十年来，他任劳任怨地辛苦供养出我和妹妹两个大学生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就是个超人！他什么都会，为了养我们这个家，他成了全能型人才。改革开放之初，父亲当上了村里的农技师。在队上老院子里，父亲搭建三米多高的木质或竹质框架，外面绷着白色的薄膜，做成全封闭的五六十平方米的温室。温室里分层放置一米多长的竹编秧盘，撒上已经泡过的稻谷种子。各家各户根据自家秧田的面积，确定育秧苗的数量，做上标记，放进温室。母亲帮着砍柴火、烧柴火，父亲负责培育这些秧苗。他熬更守夜，用温度计随时监控温室气温，确保温度

在38度到40度之间。白天，父亲还要在38度的温室里，将已经“出针”的秧苗进行压盘、换盘。高处、低处、前方、后方的秧盘每天要进行两三次换位，保证每盘秧苗受热均匀地生长。几十上百盘秧苗换好位置，整个人就像蒸了次“桑拿”。培育秧苗一次需要7到9天，全队几十户人家一年的粮食种子（秧苗、玉米苗、其它农作物）育种、杀虫的活都托付给父亲，父亲这位农技师真了不起！

耕田是农家的一件大事。家里平时养猪、养鸡鸭，有几年还养蚕，为了方便耕田，还养了一头水牛。每天早上父亲把牛牵到山上，傍晚再牵回来。在落日余晖中，父亲牵着牛不紧不慢地往回赶的场景，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。下雨天，牛被拴在牛棚里，父亲或母亲上山割草，背回来喂牛。到了春耕时节，牛成了村子里大家都喜欢的犁田能手。那些没有耕田机器，全靠牛在灌满水的田里，用它笨重的身躯，在父亲挥鞭拍打下，心甘情愿地拖着后面父亲掌控的犁和耙，一遍一遍地将田泥翻耕过来，母亲拿着锄头在后面将高出水面的地方弄平，将过大的泥块挖小。牛、父亲、母亲，他们配合得那么默契，蓑衣、斗篷、犁耙、锄头、那把拍牛的竹鞭，构成了一幅充满诗意的春耕图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和妹妹的学费、生活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父亲先是利用农

闲时间，一直在邻近乡镇的煤矿厂、硫铁矿厂里打零工，一天五元的工资；后来又跟着表叔摆地摊做茶叶生意。有时坐上一整天，连个问价的都没有；有时候运气好，一天能挣十几元。2000年，我读高中，妹妹也在城里读初中，我们一周或半月回一次家，家里的负担更重了，父亲又干起了卖蜂窝煤的活，当上了“卖炭翁”。父亲刚开始租用老板家的人力三轮车，每次拉上满满一车五百个蜂窝煤，使劲地蹬着车，在县里的大街小巷穿梭，小声地吆喝：“买蜂窝煤哦！”……“遇到买主，一梭的还好，直接用抬板，一个两斤半，一次抬三十几个；遇到家住三楼或以上的，就得用自制的背板背，一次可以背六十几个。忙完一天回家，一身都是黢黑的。晚饭后，父亲还坚持记账，每天在老板家拉出去了多少个，卖了哪些人家哪家餐馆等等，都拿我们用过的作业本的背面详细记录下来。现在那厚厚的记账本还在，有十几本。

父亲每天蹬着三轮车，满大街卖蜂窝煤。县城里的路有斜坡，蹬不上去，父亲准备了一根尼龙绳编好的两米多长的背带，拴紧了，一头绑在车座上，一头套在自己的肩膀上，两手扶着车把手，弓着身子，奋力地向上拖动，车轮缓缓地往前滑动……有时遇到好心人或者卖炭友，帮忙推一下，就轻松多了。那时有些居民楼外的巷道很窄，车子进不去，只能把车远远地停在巷道口，一背一

背地背进去。时间长了，父亲的背，再也打不直了……

家门外到县城的318国道修好了，父亲勇敢地尝试了学摩托车，并很快地买了一辆三轮摩托货车。全车两米多长，红色的，宗申牌。有了机动三轮车，父亲每次拉的蜂窝煤更多了，一车可以装一千多个。除了在县城里卖，还可以到邻近乡镇卖。父亲憨厚老实，常年有很多回头客，一个蜂窝煤两分钱到一角五分不等，利润，父亲一天可以卖几百上千个。我们姐妹俩的学费、生活费和家里的开销，都挣回来了。

2007年，我大学毕业，当了一名人民教师，妹妹也考上了大学。我们心疼父亲，不想他再那么辛劳，让他休息。再加上当时县里开通了天然气，父亲的蜂窝煤生意没以前好做了，他口头答应了，却又悄悄地开始在建筑工地收捡水泥口袋，卖给废品回收站。每次我打电话回去，倔强的父亲都让母亲不要告诉我们，免得我们担心。后来我们还是知道了，父亲总找得到理由：“这两年城里大修建，水泥口袋捡得起来，这个比卖蜂窝煤轻松多了，趁现在还在做得动，再做几年……”父亲又当了两年多的“破烂王”。

父亲常说：“我没读过多少书，但是我知道好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！”父亲辛劳了一辈子，奋斗了一辈子！他始终相信苦尽甘来，并一直保持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的精神，激励着我们不断努力奋斗！



地震后，父亲自己动手搭建临时住房。 易延端 摄

硬汉父亲的三次流泪

□易延端

我的父亲名叫易图良，彭州大山深处的农民，因病于今年4月7日去世，享年91岁。前不久，给父亲烧完“五七”香蜡钱纸后，我站在他泥土未干的坟前，思也三千，念也三千。

在我心中，父亲是一条铁骨铮铮的硬汉。上世纪那个特殊年代里，他受尽了折磨、疼痛和屈辱，但始终没有流过眼泪；在担任公社煤矿矿长时，有一次带领矿工在井下抬抽水泵，冲在最前面的他，不慎被折断的机器皮带打掉两颗门牙，脸肿得像大包子样回到家时，也没有流过眼泪。

还记得，那年家里的三间大瓦房，因遭遇泥石流滑坡冲击，突然倒塌。随后，父亲带着我们几弟兄，连续一个多月抬石砌坎、修房砌墙、糊壁头，也只流汗而不流泪。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中，父亲居住的房屋成了危房，年逾七旬的他不等不靠，自己起早摸黑，搭建临时房屋，维修加固危房，用双手重建家园，仍然没有流泪。

可是，我亲眼看见，父亲意外地流了三次眼泪。

寻找我走失的四弟，是看见父亲第一次流泪。

那时，四弟六岁多点，刚上小学。一天傍晚时分，父亲从生产队收工回家，发现四弟不在家，都扯着嗓子喊“忠——娃——忠——娃——！”没有听见回答，父亲便问我和大哥，看见四弟没有，我们说没有看到，还以为四弟放学后到山上找做活路的父母了。

母亲一急，当场就捂着双眼哭了起来。父亲忙对我说：“端娃，我们赶紧走，去找老四。”

父亲带着我来到小学校，但学校早已放学了。几个正在操场上推铁环的同学回忆说，好像看到放学后，我四弟跟着两个同班同学一起走的。找到那两个同学时却得知，四弟一个人往海窝子街上去，说是要买文具盒和彩色铅笔。

待我们心急火燎地赶到四公里外的海窝子街时，明晃晃的路灯照射得满街通明。不少已吃过晚饭的居民，在各自家门口、商铺前，或站、或坐、或蹲，三个一群五个一堆，悠闲地冲着壳子。父亲和我从街道下场到上场，挨家挨户、逐个铺面，凡有人的地方，都仔细寻找，生怕遗漏一处。最后，好不容易在街道上场的半边街菜市，发现四弟正左顾右盼地往下场走。

我的眼泪哗地一下流了下来，急忙一把抱住四弟，把我的脸紧紧地贴在他脸上，一遍又一遍地摩擦起来。

父亲眼中泪光闪闪，但他没有责备四弟一句，而是一边用双手不停地抚摸四弟的头，一边嘴里喃喃地说着：“忠娃，你娃呀！你娃呀！你娃呀……”

俗话说，树大分叉，人大分家。我们兄弟分家，是父亲又一次流泪。

父亲和母亲一共生育了七个儿，两个儿幼时因病夭折。1988年，我和大哥已结婚生子，最小的五弟也已成年了。想到父母为这个家辛苦了大半辈子，付出了大量心血，一家十口人在一起生活，也时常磕磕碰碰的，甚至闹些别扭，大哥和我便提议分立门户过日子，父母没有反对，三个弟弟也都非常赞成。我们说分家就分家，将房屋和承包的土地分成五份，好房搭着地，五坨纸疙瘩，大家各拈一坨。几兄弟对结果

都是欢喜，各自忙忙碌碌开去。但是，那天晚上，我看到父亲脸上没有了往日的笑容，一个人默默地喝着酒，双眼一直泪汪汪的。

最后一次看见父亲流泪，是1992年春节，当时我还在西安空军某部当兵。军营流行一种说法：新兵信多，老兵病多。兵当老了，渐渐对写信和收信都失去了兴致，虽然还时常思念着远方的亲人和朋友，但空闲时间大都用来吹牛皮、聊天、甩老K和睡懒觉。那时，我已当了整整十年兵了。春节探亲时，我特意到西安的几家大副食商场，为父母选购了一大包当地特产，还特意给爱喝几盅的父亲买了两瓶陕西名酒“西凤酒”。岂料，父亲对我的这份孝心不但没夸奖，反而数落了我一顿。

当晚，父亲把我叫到一边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端儿，你离开家这么多年了，前几年还经常给家里写信回来，可这两年，你的信越来越少，今年一共才写了两封，你在外边究竟是病了还是怎么了，我们都不知道，经常为你担心。特别是你妈，时常在梦中都哭着念叨你……”父亲用手揩去两行浊泪，又说：“你一个人在外边，能经常写封信回来，说说你的情况，比买啥稀奇东西回来还令我们高兴。”父亲看我早已泣不成声了，便沉默不语了。

父亲的眼泪让我心碎……

那晚，我失眠了，愧疚的泪水湿了枕头。

父亲是山上的一棵大树，枝繁叶茂，郁郁葱葱，昂首屹立，为栖息于枝丫的我们遮风蔽雨。如今，我们也已长成了大树，像父亲一样，尽心竭力，护卫着家人的平安与幸福。

诗页

时光里的父亲

(外一首)

□苏阔涵

你站在老式挂钟前
踮脚去扶正微偏的时针
阳光透过指缝洒落
在褪色的工装裤上缀起金尘

总爱把旧报纸摊平
折成我童年飞过的纸飞机
那些角落里的小字与旧闻
早已随风飞入记忆的天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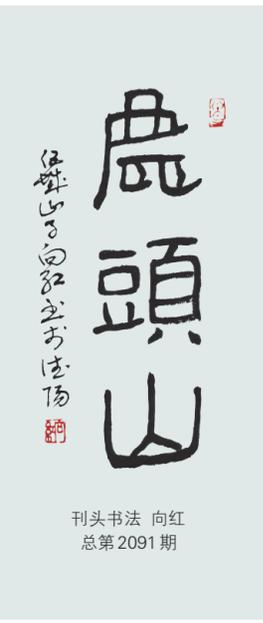
如今时间走得更轻了
你的动作也慢得像风一样
却依旧执拗地
将岁月悄悄拨回一点光亮

麦田里的守望者

他站在风起的黄昏里
背影被晚霞轻轻拉长
一顶旧草帽遮住了半张脸
却藏不住眉间间的慈祥

麦浪一层层漫过膝头
他用手掌轻抚那片金光
像怕惊动熟睡的梦
又像在守护一场远方

偶尔有孩子奔跑经过
他只是张开手臂
风吹过，他静静望着天边
仿佛在那里，看见了希望



刊头书法 向红 总第2091期

广福是千年古邑中江县的一个镇，唐高宗到元世祖时期，系铜山县的县治所在地。六百余年的县城史，孕育出了耀眼的铜山文化，延及明清依然人才辈出，纵贯1300余年，留下了诸多文物故址和良言佳话。

清明前我回川祭祖，便在一个周六上午，邀约几名师生，一起寻访了阔别多年的铜山文化遗迹。

头一天没有下雨，当天下午也不再下雨，偏偏我们约定的那个上午下雨了，我总觉得那雨是故意的。

是上天在惩戒我。我的老家石龙乡，毗邻广福，亦为古铜山县故地。从我出生到入伍离乡，石龙一直归广福区管辖，故我也算广福人。母校广福中学就在铜山衙院旧址。那时，成片的松林、清澈的山泉，茂密的修竹、散落的巨石，多是玩耍（逃学）的去处，很少有人留意那些崖刻的庄严和墨迹的清香。年少不向石刻意，再问已经不少年。上天下雨，增添不便，一定是对年少时的我“生在福中不知福”的惩戒吧。

转念一想，也未尝不是袒护我。遗迹遍布玉江两岸数公里，三大石刻群，众多小景点，加之周边数处秦汉崖墓、宋元桥亭、明清院落等，短短两个小时，甬说寻访，走马观花都做不到。正好，下点小雨，路滑，眼朦，时间不够，搞不明白便情有可原。这分明是给我这个三十几年重归故里仍浮光掠影的游子一个台阶，同时也为我再次寻访留下一个不容更改的借口。时间不裕，我们直接去了玉江北岸。

北岸松林叠翠，山径蜿蜒，从南坡绕过“状元读书台”，我们直奔山麓飞来之石刻群。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建电站而修的连拱坝，似五道缀连的彩虹横卧河中央，形态虽少古意，却为古铜山平添了一道三十余米宽的飞瀑，也算化拙为奇了。天上细雨霏霏，脚下飞流哗哗，除了唐代放生池、宋代曲水流觞记、明代苏公石像、清代十贤祠记，其他三十余处遗迹尚不及打卡，带路的吴镇长已朝“神道碑林”方向去了。

“时间有点紧，很多地方看不到哈！”站在高高挺立的苏公笔下，想着对岸的“飞来泉”，司马光手书“风火家人卦”以及“铜山八景”之“当阳胜处”，我不禁自责时间抠得太紧。

“全都要看完，得一天时间。如果看细点，那就不好说了。”年轻的镇党廖书记接过话茬，有些骄傲地说道。

“可看之处真的很多，明显比网络介绍的多，比我们上学时也多多了。”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大惊小怪，借机也“非直接”地给近年来镇里的工作点了个赞。

“实际上，还有很多遗迹，被水淹没了。比如‘放生池’下方，有‘铜山县’三个篆体大字，宋代遗迹，笔力古劲，非常震撼，只有枯水期才能一睹风采。还有一组唐代的菩萨雕像，真可谓精妙绝伦。”廖书记用手指着那方被春水围掩的巨石，连续点了好几下，每一下都透着一份急切和一种坚定。

“文献记载的美女晒秋、千人下跪石刻造像不在水下，也很难说。广福自古就是梓州与成都之间的主要驿站，文人墨客往来不少，杜甫就来过，还写了一首《光禄坂行》。玉江河曾经也是货船、商船、客船络绎不绝。因为没有特别重大的考古发现，一直也没有大面积挖掘的契机。”廖书记连连感叹。

“水下、地下还有一个我们没看见的广福！”我一边说着，一边要拍照，失手把雨伞遗落在地。这一刻，雨也突然大了，似乎要把那些水下、地下的宝贝掩藏得更深一些。

“书记说的是实物。还有一些就算抽干了河水，或者掘地三尺也看不到哦！”一旁的林老师轻声说道。

林老师是县文联主席，中江书画院院长，年逾古稀，德高望重，一直致力于家乡文化的挖掘、保护和传承。大家闻声后，不约而同转身向着他。林老师稍微高举了一下雨伞，望了望书记，然后盯着我，认真地说道：“县里、镇里，包括一些在外工作的乡家人，非常关注铜山文化，几十年挖掘、保护、传扬，有不少生动感人的故事，绝大多数没有落到文字上，靠肉眼是看不见的。”

“那应该抓紧整理出来！”同行的覃校长和易老师异口同声。

林老师学养深厚，提携后学，说话点到为止，却让我陷入了短暂的沉思。广福自古文脉兴盛，到北宋更是涌现了“三苏”文化名流。自然，这“三苏”不是那“三苏”，这“三苏”乃宋代四川地区第一位状元苏易简，以及他的两个孙子苏舜元（书法家）、苏舜钦（文学家、书法家），是那“三苏”的前辈（苏舜钦比苏洵还大一岁）。千百年来，铜山文化特别是“三苏文化”对这方土地的滋润、对后世后辈的影响、对民风民俗的培塑，以及官方民间对本土文化的珍视或漠视、守护或疏隔，不去深入探究永远不会明晰。这些思想意识层面的独特宝藏，不也是另一个常人难以看见的广福么？

《铜山纪胜》依附山体、规制宏伟，我们没做停留。这地方我上学时就传闻最多，诸如“又有书法家来搭着梯子拓字了”“成都的专家来拍照了”等等，因而来过数次，相对熟悉。但此处的书法并不是铜山的至宝，唐人虞世南的手书，助力康有为书法自成一体的唐代碑记《石亭记千秋亭记》，更是享誉四方。

再往前走，重建的铜山寺在细雨晕染下更多了些岁月的沧桑，尤其那座高30米的“坐式观音”，烟雨环绕，山岚缠绵，愈发仙气飘飘。在不少百姓心中，铜山寺、广福院远比“三苏”重要得多，知名得多。这也正常。铜山文化是个大概念，作为苏舜钦第一本传记作者的我也认为：“铜山三苏”确乎铜山文化的杰出代表，但铜山文化却非“铜山三苏”可以囊括。

顺着这个逻辑，我进一步想，铜山县归于历史后，其文化已变为中江县城文化的一部分。七百多年过去了，“铜山文化”依旧是广福历史文化的高光时刻，但它已不是广福历史文化的全部了。换言之，今日广福的区域文化，不会是，也不该是“铜山文化”的单一承续和发展，它已有了更为广博的渊源、更为宏阔的时空。因此，这些非“铜山文化”因素及其影响，在多数人专注于“三苏”和“古铜山”之外，又构成了再一个“不易看见的广福”。

山川河流的深处，思想情感的深处，时光岁月的深处，各自隐藏着不一样的广福。这突然悟出的认知，或许并不准确，却叩应了那轻盈的雨、朦胧的天和急促的行程。我坚信，任何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，其根其源，其道其风，其筋其骨，是一眼看不尽的，更是肉眼看不穿的。

找到了为自己挂一漏万而开脱的理由，也减轻了因年少无知而留下的懊恼。寻访虽短暂，我的收获却是丰盈的。跨过宋代古桥——挂金鱼桥，快步登上已逾千年的宝峰书院，望着店肆林立、人流涌动的玉江南岸，看得见的广福古韵与时风交汇，繁华与宁静重合，而身许他乡的我却更着迷那“不易看见的广福”。